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包世臣碑学思想广泛传播原因探微 ●先秦时期的吏官与书法 ●《知不足斋丛帖》与姚邵亭草说 ●郭尚先书法及其字号考辨 ●关于书法的形质与神采 ●黄牧甫印风综述

書法研究



总第一二九期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書法研究

· 总第 · 九期 ·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2
(书法研究)
ISBN 7-80725-305-3

I. 翁... II. 上... III. 汉字 - 书法 - 中国 - 清代 - 文集 IV. J292.1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4645号

主 编: 卢辅圣
副 主 编: 沈培方
责任编辑: 江 宏
庄新兴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王 峥
技术编辑: 吴蕃中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本社编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电话: 61229010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90千字

印张: 4 印数: 1-3,000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25-305-3/J · 288

定价: 6.00元

目 录

1	朱友舟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55	薛帅杰	包世臣碑学思想广泛传播原因探微
70	吴高歌	先秦时期的史官与书法
79	吴 聪	《知汝殊愁帖》与姚鼐今草说
88	俞建良	郭尚先书法及其字号考辨
97	黄鸿琼	关于书法的形质与神采
106	傅 舟	黄牧甫印风综论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研究

朱友舟

〔内容提要〕

在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盛行的背景下,翁方纲提倡尚古、尚质厚的审美观,极力推崇学习汉碑、唐碑,开启了乾嘉崇唐学欧之风。同时翁方纲一再肯定北碑作为欧、褚楷书源头的重要地位,对于碑学书风的形成具有一定历史意义。但是,翁方纲的师古主张存在泥古不化的缺陷。翁方纲与阮元、伊秉绶等人均有密切的交往,对当时的碑学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金石学 古朴 唐碑 北碑 翁方纲

一 引言

翁方纲是乾隆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书家。由于他在经

• 1 •

学、诗学、金石考据学、书学等方面的突出的贡献,而使他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现代研究翁方纲的专家、哈佛大学的沈津先生于此做了大量系统的工作,他编写的《翁方纲年谱》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基础工程,沈先生为此辛勤耕耘达数十年之久,为我们进一步地系统研究建立了基础。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对翁方纲的著述作了考察与评论,但大多为研究其诗歌理论。在书学研究方面则相对薄弱,成果主要有:徐利明先生的《“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第三章“篆隶笔意”与清代新古典主义碑学书风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王镇远先生的《翁方纲的唐人楷书论》;刘恒先生《清代书法史》中有部分章节介绍翁方纲的书学;朱乐朋先生的《翁方纲书学理论研究》及童一鸣先生的《翁方纲年谱》等。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翁方纲的书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朱乐朋把翁方纲的金石学单列一章进行研究,表明他已经注意到翁方纲的书学与金石学的关系。徐利明先生提出的“篆隶笔意”是贯穿四百年书法流变的主线的观点可作为研究翁方纲书学思想的重要参照。刘恒先生认为“翁方纲生当学术风气转变之时,其书法创作和书论研究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①;王镇远先生肯定了翁氏力倡唐碑的意义,但王先生认为翁氏把唐碑溯源到王羲之而忽视了北碑的地位。刘恒与王镇远两先生的说法都有待商榷。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把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置于贯穿明末以来四百年书法流变的“篆隶笔意”这根主线上来探讨。“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是翁方纲书论的总则。具体而言,翁方纲主张“以晋为宗”,但是他认为只有“以唐溯晋”,才能正本探源。同时他还主张学书必须注重学习汉碑,“以篆隶为本”,并以敏锐的目光发现和进一步肯定了北朝碑版上承隶法、下启唐楷的历史作用。就四百年“篆隶笔意”这根主线而言,翁方纲的书学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将翁方纲的书学与金石学结合起来研究,并对翁方纲与阮元、伊秉绶的交游作考察。同时

对翁方纲过于泥古的师古主张作探讨,这对于当今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本文的立场问题,先作一个界定。就整个清朝而言,帖学逐渐衰微,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金石学的兴盛、帖学的衰落,碑学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乾嘉时期的书风,正处于帖学渐渐地向碑学过渡、融合的阶段。碑学作为新生事物,当然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本文将站在碑学的立场,把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置于四百年“篆隶笔意”这根主线里,来考察其在书法发展史中所起的作用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认为碑学孕育于金石学,其内容不仅是对碑版墓志、摩崖刻石、瓦当砖文等搜寻著录、考证研究及临习取法,并且包含了书法家“崇尚尚朴”的美学思想,成为书学研究领域专门的学科。

对本论题的研究,笔者先从史料入手,并在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后,不拘于某一种研究方法,采用思辨与实证以及比较法、统计法、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兼用互补地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对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的形成和主要观点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二 翁方纲书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生存条件。统治者所推行整理典籍的文化措施,对朴学的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乾隆时期,历时十年之久,编成了多达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在此过程中,学者必须对照不同的版本和资料进行考证。因此,承清初余绪,乾嘉时期的经学——朴学迅速发展,已经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及音韵等专门学科获得突破性进展,在推动整个学术风气改变的同时,对书法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碑学理论的发展。作为乾嘉时期书法界重要的主张碑帖结合的金石学家——翁方纲的书学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产生的。

(一) 金石学的繁盛

明代灭亡后,顾炎武、黄宗羲等认为“心学”是导致了明王朝的衰亡原因之一。因此,他们从事经学研究的同时,对经世致用及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了着重强调。加之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与文字狱的淫威所迫,许多文人转向金石校勘学问,借朴学以自保,朴学的附庸小学、金石学及相关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朴学一开始便把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可信的依据。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朱彝尊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黄宗羲著有《金石要例》,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开辟了先声。乾嘉时期的学者很多均擅长金石学,研究金石学已蔚然成风,名家辈出,成果众多。钱大昕作为一代学术领袖,嗜好金石,辑录金石二十余年,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编有《寰宇访碑录》,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毕沅编撰了《关中金石记》及《中州金石记》。著名学者王昶搜罗编著了长达一百六十卷的巨著《金石萃编》,这些都是乾嘉年间金石学研究成就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翁方纲亦酷嗜金石考据之学,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等大量金石学著作。在金石学的研究过程中,以古为尚的复古精神也随之深入翁方纲的骨髓。此外,由于金石学与书法的关系密切,金石学的发展也促成了书家学者化的局面。

(二) 赵董书风的盛行

康熙年间,由于清圣祖玄烨的推崇,董其昌书风笼罩整个书坛。玄烨特别爱好董字,自己也擅长写董体。当时,以书法著称的沈荃、高士奇、陈邦彦等都是董书的追随者。科举考场也流行董氏书法,如果写董字,被录取的机会更多,仕途也更顺畅。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弘历则喜爱赵孟頫书,他能写一手赵体,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弘历

的影响下，“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②。弘历身边的近臣如梁诗正、董邦达、董诰父子、于敏中、汪由敦等人的书法都以整齐圆润见长，在当时名满朝野。在名利的驱使下，读书人必然投其所好。可想而知，当时的书风主流便是以董、赵风格为代表。这种盲目追随赵、董的风气导致了帖学书风的衰落。其实，早在康熙年间董书盛行之际，已经有一些书家认识到了董书的靡弱和学董的单一。^③王澎指责学董者为“董家恶习”。^④由此可见，少数书家对于董书不满的现象由来已久。翁方纲也意识到学董书者不论楷书、行书，唯以圆、美为能事，书风渐渐流于软熟；临赵书者也日渐软弱，缺乏浑厚之气。因此针对当时人们一味追慕赵、董的风气，翁方纲主张学习唐碑、汉碑，以篆隶为本。在这种背景下，翁方纲书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便凸现出来。

三 翁方纲书学思想的成因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艺术家成长的经历和环境必然会影响他的性格及艺术思想。翁氏崇尚质朴与其性格及家庭环境颇有联系。“翁方纲十六岁丧父，随母寄食于外公家，家境贫寒。后二年，外祖卒。之后先生奉母居巷西小屋二间以居，益困乏矣。”^⑤翁方纲家世素寒，本性质朴，在其为官生涯中，始终以谨慎、勤奋、俭朴为座右，以示警戒。风格的质朴决定了翁方纲在艺术上以质厚为本的审美主张。翁氏的书法风格质朴、浑厚正是其书学思想的反映，也是其主体精神的张扬。翁氏的书学思想的形成深受前人的影响，深受其金石学及诗歌研究的影响。

（一）书学思想的渊源

作为金石学者、诗人的翁方纲，其金石学及诗歌理论深受前人的影响，而书学又与金石学，诗学密切相关。翁氏的书学思想受金石学家欧阳修、诗人及书家黄庭坚、书家赵孟坚、^⑥清朝金石书家朱彝尊及何焯、王澐等人影响较大。翁氏诗宗江西派，出入黄庭

坚、杨万里之间。其尚古、尚质厚的诗歌、书学思想实际上源于黄庭坚。黄庭坚有一段著名的书论摘录如下：

然要须以古人为师，笔法虽欲清劲，必以质厚为本，
古人论书，以沉着痛快为善……凡书之害，姿媚是小疵，
轻佻是其大病。^⑦

翁氏继承了黄庭坚“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主张，将其作为书学及诗学的指导思想。翁方纲论诗、论书时反复强调这一主张：

山谷云：“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不第为学书者言之也。^⑧

山谷有言曰“以质厚为本”，姜白石曰“离而能合”，此二语是诗文、书法之总诀也。^⑨

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曰质厚而已矣。^⑩

夫士，以学养为归，以质厚为本，此读书立身之要言。^⑪吾尝宝山谷二言曰：“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三十年来，与天下贤哲论文，不出此语。^⑫

可见，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翁氏都深受黄庭坚的影响。

关于北碑较早的评论可见于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的《集古录》。《集古录》是目前所存金石碑帖著录类书籍最早的一部，具有开创之功，影响极大。欧阳修在《集古录》对北碑的遒劲、古朴的风格作了客观的评价。这些评价对后来的金石学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集古录》中，记《后魏神龟造像碑记》有云：

余所集录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辄弃者，以其时有所取于其简也。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独其字画往往多工妙。此碑字画实是遒劲，尤可佳。^⑬

记《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

文为声偶，颇其怪而字画亦佳，往往有古法。^⑭

记《北齐石浮屠记》有云：

时时字有完者，笔画清婉可喜，故录之。^⑤

记《后周大像碑》云道：

惟其字画不容，亦有取焉。^⑥

欧阳修所言隋以前碑志，乃指北朝石刻书法。欧阳修对北朝石刻书法的赏识，在宋朝只是个别现象。到了清初，朱彝尊、王澐、何焯等人对北碑偶有少量的论述，但尚未成规模，这是帖学时代使然。朱彝尊在跋《北起少林寺碑》时云：

文本正书，杂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类此，书家

嫌其乖劣，然以拙笔见古，与后代专逞姿媚者不同也。^⑦

所谓书家嫌其乖劣，反映了当时帖学书家的一般看法，而朱彝尊精于金石考据，又擅隶书，直取汉碑，他能欣赏到北碑书法的拙朴中具有篆隶古意。

关于北碑，何焯也偶有正面的评述，他认为北碑意态开阔，具有朴素之美。其跋《魏营州刺史崔敬邕志》云：

入目初丑拙，然不衫不履，仪态开阔，唐人终莫能及，

未可概以北体少之矣。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

拘局，欧虞即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⑧

何焯还有南北分派的言论，其跋《子宁堂法书》云：“然自晋永嘉而后，派别遂分为南北。”^⑨可见，碑学思想在清前期已露端倪。翁方纲嗜好金石考据学，自然会受到上述金石学家或书家的影响。

王澐书入率更之室，篆法李斯。王氏在实践上极力学古临古，在书论上厚古薄今。其论书多褒扬碑刻，贬斥法帖。尤其对清初崇董风气大为不满，斥为董家恶习。王澐推崇汉碑尤其《礼器》、《乙瑛》、《史晨》等汉碑。王澐云：

汉人隶书每碑各有一格，莫有同者，大多以方劲古拙为尚。^⑩

隶法以汉为极，汉隶以《孔庙》为极，《孔庙》以《韩敕》为极。此碑极变化，极超妙又极自然。^⑪

翁方纲也推崇《礼器》、《乙瑛》等碑，其跋《郑固碑》云：

密理与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礼器》第二，《乙瑛》第三，《孔宙》第四。^②

翁方纲称赞王澐论隶书有独到的见解：

虚舟（笔者注：虚舟即王澐）论诸书出《礼器碑》，其论隶最不直郑汝器，可谓于书道有独得者。^③

然而在评价欧书上，翁方纲与王澐的观点颇为不同。王澐《跋化度寺碑》曰：

评者目《化度》胜《醴泉》，非笃论也。此本才数百字，其完好者仅百余。然霜晓长庚芒角烂然，正自有目共仰。^④

翁方纲则认为《化度》胜过《醴泉》，批评了王澐的“长庚芒角”一词评价《化度》不妥：

虚舟不以《化度》胜《醴泉》之说为是者，盖其病先中在长庚芒角一语……独于欧书只效其皮肤耶？^⑤

显然，翁方纲在推崇唐楷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王澐以铁线篆著称，并追求篆书用笔的瘦劲，“古人作字无不始于瘦劲。吾尝得安阳古币‘安阳’二字，笔瘦如铁。又尝见‘大禹开山’币面四字，亦笔瘦如铁”^⑥。翁氏则以为篆书不能一味求细、求瘦。翁氏云：

篆书非仅以瘦为主也。近日金坛王若林论篆书用笔须如蚕吐丝，谓篆贵瘦也。然必以瘦为定式则未也。尝以周秦篆石本考之，以今尺度之，石鼓画宽一分，琅琊台篆文画宽一分二三厘许。其之众篆尚有数字在，《汝帖》‘虽重摹，然非徐郑辈重书不可比。以前说度之，亦约宽一分五厘。是则字愈大则画固之加肥，彰彰明矣。必无专执瘦细为式者也。^⑦

翁氏通过鉴别比较推断出字愈大则画必定加肥的结论，是有道理

的。这对于当时写篆一味求细劲的风气，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这与翁方纲追求浑厚的审美情趣也是一致的。

翁氏不但在书法理论上扬弃了王澐的思想，在实践上也是如此。翁方纲致力于欧阳询的《化度寺》，结体则取法虞世南《孔祭酒碑》。沙孟海说：“王澐写这一体最好，翁方纲是用王澐的方法去学晋唐人的。”^⑧是颇有见地的。

（二）金石学研究对其书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乾嘉时期，学术主流是朴学。朴学的精神，一则复古，再则求实。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⑨复汉唐之古，复先秦之古，唯古是尚。因此在当时的学术界盛行复古、求实之风。金石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的。翁方纲年轻时就对金石学表现出极大兴趣。尽管生活贫困，他依然每晚“篝灯孜孜缀拾两汉字义”^⑩。翁方纲走上仕途后，依然很关注金石学，在金石碑版的收藏和研究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钱泳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又邃于金石文字。”^⑪翁方纲自称：“予篋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⑫翁方纲是乾隆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当时的金石学可分为三派：一派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正经史缺误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钱大昕为代表；一派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以王昶为代表；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另一派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完缺及书法特点的鉴赏。^⑬翁氏一派在收集研究旧拓、精拓，对书家的择善取法临习影响尤深。后来大量书家收藏、鉴赏碑版石刻，多延续了翁方纲的研究特色。翁方纲致力校订金石之学，博证详稽，确然有据。凡金石碑版，翁氏一看便能断定时代。因此海内孤本名刻，藏家不远千里，登门请求翁氏鉴定，以得先生一言为重。翁氏有关金石著作甚多，诸如《两汉金石记》、《焦山鼎铭考》、《孔子庙堂碑唐本存字考》、《化度寺考》、《汉刘熊碑考释》、《苏米斋兰亭考》、《题嵩洛访碑图

记》、《瘞鹤铭考补》、《汉石经残字考》、《粤东金石略》、《海东金石文字记》等。作为金石学研究的主将，翁方纲认为研究金石一方面可以考证经史，另一方面则可以研究、鉴赏书法。在翁方纲看来，考订金石能廓清书法及书体的源流发展规律，也大有裨益。翁方纲说，如果认为考订金石仅仅为研究经史，而不屑于书法，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在《自题考订金石图后》中，翁方纲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抨击：

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也。

凡考订金石者，不甘居与鉴赏书法，则必处处据摭某条某条足订史误：金石文足订史误，固时有之，然其确有证者，若唐年号大和误太和、辽寿昌误寿隆，似此之类，则无可疑者。偶有□拉，苟非确有证据，何以知史必非尔碑必是乎？且即以篆变隶、隶变楷以来，上下正变之概，岂易罄陈而可忽视之乎？正惟力穷书法原委而时或他有所证，则愈见金石文之裨益匪浅也。其书极丑劣而足证史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³⁹

翁方纲以为研究金石如能追溯书法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能别有所证，就愈能显示金石研究的好处。可见，翁氏非常重视金石对书法研究价值。因此，其书学观念与其金石学研究关系非常密切。其金石学对书学影响可谓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影响。

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详记两汉金石，鉴别不爽，立论极有独见，可谓研究汉隶集大成的权威著作，比清初对汉隶的研究更系统、更深化了。《两汉金石记》成书于1789年，长达二十二卷，内容包括汉碑、汉印、砖瓦文等。同时代的大学者王昶评价极高：“剖析毫芒，并且参以《说文》、《正义》，几欲驾洪文惠而上之。”⁴⁰可见，翁方纲对汉隶的搜集、保存、传播、考证等方面贡献巨大、罕有其匹。这对于纠正清前期隶书取法唐人、随意妄作的现象，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翁方纲在鉴赏研究过程中，对两汉金石碑版的书风作了详

尽的评述,下面选取《两汉金石记》的跋语加以分析:

《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是碑之书,孙北海赏其简质。予以为字画差小而道古弥出他碑之上,不特不病于板拘,即简质亦尚不足以尽之耳。^④

碑文“长生未央”,未央二字在左之下,形质古朴。^⑤

《汉故王君之碑》,通体皆篆,其书状如螺扁,有先秦自然之妙。此碑其字特古质。^⑥

《汉故凉州刺史魏君之碑》,是碑朴实、苍劲,微以《张迁碑》而加之流逸,又间出以参差错落之致。^⑦

由此可见,翁方纲认为汉隶的风格以质朴、古拙为主。在研究过程中翁方纲通过归纳总结,确立并强化了自己崇古尚朴的审美思想。在《两汉金石记》的序言中翁氏提出了“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指导思想。翁方纲又强调:“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质厚已矣。”^⑧

从反面来看,翁方纲的研究金石考据的学者性情及研经的道学气束缚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翁方纲看来,经学训诂与艺术文学不是两码事,“训诂与艺文非二事”^⑨。金石考证斤斤计较的严谨态度被转嫁至其的书学中。清代中期书法家多为学者,这一点较之以前有所不同。正如朱乐朋先生所说:“中国历代书法家身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晋代主要是风流名士,南北朝主要是无名匠人,唐代主要是高官权臣,宋代主要是文艺大家,元明主要是画坛盟主,那么清代除一部分画家外,更多的是学者大儒。”^⑩此说颇有道理。的确,书家往往为学者是清朝书法界较为明显的特点。原因盖为金石学兴盛所致,而书法与金石学又密不可分。翁方纲是乾嘉时期学者书家的代表。通过研究翁方纲,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乾嘉时期学者书家群。

四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要论

清代书家众多,然而人们所称四大书家不论谓翁方纲、刘墉、

成亲王、铁保，还是谓翁方纲、刘墉、王文治、梁同书，而其中总少不了翁氏。由此可见，翁方纲的书法作品和书学思想在当时的成就之高，影响之大。^⑧由于翁方纲对金石学的长期、深入研究，因此他对书法的书体演变、发展及异同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是其书论的总则。具体而言，针对当时一味追慕赵、董的时风及圆滑、靡弱的书风，翁方纲于书法创作方面和其他帖学家一样也主张“以晋为宗”，但是他认为应该要“以唐溯晋”，而非以阁帖溯晋，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探源。事实上，翁方纲欲以唐石刻楷书矫正法帖、墨迹的不足。同时他还主张学书必须注重学习汉碑，以篆隶为本；并以敏锐的目光发现和进一步肯定了北朝碑版下启唐楷的历史作用。如徐利明先生所说，“篆隶笔意”的书法观念与书法实践，是四百年今体书法流变的内脉与主线。^⑨翁方纲的书学思想则是这一主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进步意义。我们试从如下角度来探讨翁方纲的书学思想。

（一）以晋为宗，以楷为正，以唐溯晋，肯定北碑

1. 以楷为正，推崇唐碑楷书，以唐溯晋

翁方纲主张以晋为宗，他眼中的晋法则强调篆隶古法，而非目之以秀媚。他认为：“右军之书，得于篆隶为多，故应从六书源头溯之。”^⑩“右军实原于周岐阳十鼓及汉人分隶。”^⑪由此可知，翁氏认为晋法得之于篆隶，以晋为宗就要求今体书讲求篆隶笔意，以篆隶为本。翁氏云：“以晋为宗，以篆隶为本二语，书家心印，尽具在是矣。”^⑫翁氏主张学书须以楷书为正统，以唐楷溯晋，而不能一味地追慕宋以来的米、赵、董诸家，浅尝辄止。翁氏云：“人皆知有明一代书，结穴于董文敏，然明人书开始者当谁属？吾必推南宫生矣。如此则由董书直溯魏、晋、六朝矣，慎勿日膺董书，而至求之于米海岳、吴云壑诸老以还耳。”^⑬

书法到唐朝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极致——楷书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宋元以后，书家转而重视行草书，至于书法史中所形成的举

世囿于《淳化阁帖》的局面，到了清初时也盛极一时。当时，有一些书家认为法帖尤其《阁帖》是书家的临池唯一指南，是必备之物。如王文治云：“且重摹之本（笔者注：指《阁帖》重摹本），每本必有一种胜处，自是临池家指南。后世学书者，未能精熟《阁帖》，不可与言书。”^③可见王文治非常重视行草书。但是由于金石学的发展，客观上促使了书家们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反思。翁方纲认为这种专务从阁帖中去上溯晋人的方法存在错误，而造成了清初书法的以圆美为能事，风格靡弱、秀媚。翁方纲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所在：

今之高谈米法、董法者，不论真行，惟以圆美为能事。

其弊渐流于软熟，乖方矩之义。^④

针对宋以后专务行草书的现象，翁氏云：“然即以今体书言，亦当以正书为主。”^⑤翁氏从正本探源的角度明确提出书法应以楷书为正统，而不能以行、草书为正统。翁氏认为如专务行草书，即使宋代的米芾于占法也仅能得大意。这表明了翁氏推崇楷书的目的是追求魏晋古法，追求篆隶笔意。而由唐以上问津右军，必须从楷书开始。翁方纲认为：

自来老已专用力于行书，其于古人，分际第拈取大意，遂自谓得之矣。若虞欧以上，由萧羊而问津山阴，自必从楷书始。褚河南西堂手定右军书目，以《乐毅》、《黄庭》冠之，未有舍楷不问而专事行草者。^⑥

正因为其以楷书为正统，翁氏对法帖与墨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贬低。翁方纲对当时举世所尚的法帖之祖《淳化阁帖》作了批评，翁氏在其跋《淳化阁帖》中云道：

法帖莫先于宋之淳化阁，乃开卷略及篆书亦无所考据。又不及隶不及楷，纯草书成编。其草书亦又无考据。世所传法帖之祖乃草草如此。^⑦

翁方纲认为法帖之祖，过于重视草书而忽视了隶、楷，存在一定的